

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联系

——亚洲发展中地区空间经济转变的新理论框架

马 昂 主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

1 城乡转变的新理论

传统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理论, 基本建立于西方经验的基础上, 因而不足以解释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外围区域的高速增长现象。这些区域往往地处核心城市间的交通走廊地带, 其非农产业的发展尤为迅猛。其中, 中国又显示出特殊的发展型式, 即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 未发生人口大量迁入大城市的现象。如长江三角洲地区。Ginsburg 和周一星指出, 这里是中国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地区。尽管面积只占全国的1.4%, 却集中了7%的人口, 8%的农业产值和30%的工业产值。苏南农村的乡镇工业已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65%以上——考虑到这一地区还有不少大中工业城市, 这一比例是非常高的。本文拟以desakota概念作为理论框架, 来理解这一空间经济转变。

Mc Gee提出的desakota概念是指在同一地理区域上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行为。它被用来表示在亚洲大城市之间交通走廊地带的农村地区所发生的、以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行业的迅速增长为特征、商品和人流相互作用十分强烈的发展过程。其着重点不是在城乡区别上, 而是在空间经济的相互作用及其对聚居型式和经济行为的影响方面。Mc Gee把亚洲的这些区域称为“超级城市区”(megaurban regions), 其范围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由发达的交通联系起来的核心城市、当天可以通勤的城市外围区及农业与非农行业混杂的人口稠密的农村区域(即desakota区域)。这种地区的出现, 使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变得不太明显。在此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背景加以概述。①农业生产(一般以水稻为主)是重要的经济基础, 正是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历史上能够支撑较多的人口。尤其在农闲时期, 有较多的农民可以从事其他活动。费孝通在描述苏南农村工业化的条件时指出了三个因素: 大量的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 可开垦耕地的匮乏; 农民以手工业和副业生产补充家庭收入的传统。②上海、南京、无锡、苏州等大中城市的存在, 为季节性的劳力提供了机会, 又为农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市场。农村地区的一些国营企业的建立, 也越来越需要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城乡合作, 因而与城市的联系对这些农村地区的农业和非农业发展都很重要。尤为突出的是, 苏南地区与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③desakota地区以高度的“交易”(transactive)环境为特征, 特别是在人、商品和信息的流动方面。这种流动建立在较为发达的公路、铁路、运河、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之上。稠密的水系历史上曾是主要交通通道, 但其他交通形式的发展(尤其是汽车)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已开始建设的上海至南京的高速公路, 将使沪宁两地的交通时间由目前的5小时缩至2小时, 这一地区的交通条件将进一步改善。④全球经济扩张的作用和国际劳动

分工的需求对desakota地区的影响也应予以考虑。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尽管长江三角洲地区吸收的外资尚少于珠江三角洲,但其重要性却日渐增强。上海和苏南的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外部因素与区域内动力的结合,将继续推动本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根据Mc Gee的分析,desakota区域有六个主要特征:①有较稠密的人口,过去主要从事水稻耕作,且在历史上通过交通网络与其他地区有较多联系。②非农产业增长明显。在长江三角洲,这些非农产业包括商业、交通及以轻工、纺织、建材等为主的众多工业部门。这种增长往往使区域内部的相互作用与对外联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非农产业的空间繁衍方面。③desakota地区又以混杂的土地利用方式为特征。农业、副业、工业企业、住宅及其他各种用地方式彼此相邻。伴随对土地需求的增加,土地的利用程度不断提高,但也导致了可耕地的丧失和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④desakota地区一般以人口的流动性为特征。在长江三角洲,人口不是永久性地迁入市镇,而是通过较为廉价的交通方式(自行车、公共汽车及正在兴起的摩托车)通勤至工作地点。有意思的是,从大城市通勤到desakota地区工作的人流也在增加。⑤妇女在非农产业中越来越多的参与是desakota地区的又一特征。这一特征虽然与工业和服务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有关,但似乎与“释放”妇女劳动力的农业生产形式的转变关系更为密切。在长江三角洲尽管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很少,观察的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特点。⑥由于大部分desakota区域都在中心城市的行政区域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看不见的”或“灰色”区域。城市型的工业和劳动法规在这里要么没有,要么难以实施。而与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相比,这里的办事手续也更为方便。

关于desakota区域的论述已有不少,并已成为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中Mc Gee提到了三个方面问题:①这些新型的经济区域与城市转换理论的文献中经常提及的“城市影响区”究竟有何不同?它们与由交通改善形成的大城市的外围区又有什么不同?长江三角洲地区desakota地区的存在依赖于他们与其他农村地区及区内大城市的关系,因而研究desakota地区必须通过考察核心城市与周围地区的联系来确定城市所起的作用。然而,这一考察必须从农村的角度出发,因为这些现象产生于农村而且对农村的意义尤为重要。以前的很多研究则是从城市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发展的;②在desakota区域内,是否有具体事实来说明经济行为的实际产生过程?对此,关于当地的历史、地理背景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③这种现象是短期的还是能维持较长的一段时期,在发展进程中,集聚力是否会逐步起主导作用?所有关于desakota的论述中,动态的城乡联系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把它看作是desakota地区形成过程的中心环节。

2 城乡联系

在中国的空间经济结构中,由于城乡工业发展的相互补充和渗透,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已不是那么明显了。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周围,广泛的经济往来打破了城乡经济的分割。在长江三角洲,城市工业通过城乡联营等方式大量扩散到农村地区,乡村企业也十分重视与城市建立联系。这些城乡联系包括:资金投资流、信息交换、来自城市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城乡市场的商品交流及城市的技术设备与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的交换。随着交通、通讯的改善,空间距离相对缩短,这些联系也变得日益重要。除城乡联系外,其他的重要联系过程有:工业部门之间及工业与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复杂的所有制结构及行政联系。

尽管地理学文献中有众多关于城乡人口迁移的论述,但直至最近,鲜见有关发展中国家广泛的城乡联系及相互作用的文献。相反,城市和乡村发展被作为独立的问题分开论述。对

这一问题的关注及对西方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理论的不满,使人们对发展模型作了新的评估(Lipton, 1977)。以下将结合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情况,对最近有关城乡相互作用的理论作简要回顾。

分开看城市和乡村,很容易忽略各自变化间的联系。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城乡变化不应被看作独立的过程,而应作为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变的产物。这种注意力的转移,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在亚洲研究方面。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城市变化和农村变化的相互作用。这里着重讨论Lipton (1977)、Rondinelli (1985)和Stohr与Taylor (1981)三种观点,它们代表了研究城乡相互作用的三个角度。

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政策,最直率的批评来自Lipton (1977)提出的“城市偏向”(Urban bias)概念。他试图证明,在贫穷国家,最重要的冲突不是劳动力和资本,也不是外来利益和本国利益,而是在城市集团和农村集团之间。为此,他不同意所谓城乡间没有明确界线的说法,而是阐明资源的分配如何受到城市偏向的影响。简言之,Lipton认为,城市的人掌握了这样的权力,使资源能不合理地流向他们的利益所在而偏离农村人口。他认为这种城市偏向不仅使穷人更穷,而且还引起了农村地区内部的不平等,因为农村富农与城市集团的合作将剩余的食物、储蓄和人力资本提供给了城市。

Corbridge (1982)提出,“城市偏向”的症结,在于低廉的食物价格及其他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的价格政策;在于倾向于城市工业的投资战略及由此引起的乡村技术的流失;还在于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的落后。然而,Corbridge也在理论上对Lipton的“城市偏向”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批评。首先,他指出不存在没有内部差别的城市和农村,Lipton忽略了城市穷人和农村富人的存在。其次,关于Lipton的集团概念,Corbridge指出,对于农村社会的上层人士,如果考虑到食物、价格、交通和教育设施,他们是“农村集团”的自然领袖,而如果考虑到农业的生产投入,他们又同时成为“城市集团”。最后,Corbridge指出Lipton将政治的概念过于简单化,因为他认为城市和农村集团都有明确的政治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明晰的城乡政治对立。

Rondinelli (1985)认为,城市的规模等级是决定发展政策成败与否的关键,与那些主张以农村为基础、自下而上的发展方案不同,Rondinelli指出,任何精心设计的农村发展目标,如果与城市割离,完全采取自下而上的战略是不切实际的。从实用的角度,他指出了联系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农业剩余产品的市场在城市;大部分的农业投入由城市机构提供;随农业生产率提高释放的劳动力需寻找就业机会;许多社会、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也都由城市扩散。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如欲取得社会和空间意义上的全面发展,他们的投资在地理上应较为分散。这种全面发展需要有一个完整、分散的城镇体系,以给整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提供进入市场和获得服务的机会。这一方案认为在相对分散的一些聚居区进行战略性投资,可以为农村人口提供自下而上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自治的进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Rondinelli对联系的看法,包括农村与小城镇及大城市与小城市的联系。与Lipton不同,Rondinelli认为中小城市的社会经济基础可以促进和实现农村变化,这与中国学者费孝通等提出的论点相似,即在中国,小城镇发展的滞后是农村变化最重要的制约因子。Rondinelli的基本结论是,可以找到一种城乡平衡发展的模式。这样,既然发展中国家的城镇体系目前均以大城市为主,为获得平衡的发展,就需要采用刺激中小城镇成长的政策。

如果说Rondinelli的重点是通过控制城市等级实现利益的转换,Stohr和Taylor(1981)的论点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为使发展更为公平,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政策必须在根本上

与自下而上的方法结合起来。在他们看来,自下而来的发展是以各地的自然、人力和制度资源的最大利用为基础,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需求为首要目标的发展,它应该直接面对贫困的问题,并须由下面来发起和控制。因而,它与Rondinelli提倡的方法截然相反,一般以农村为中心,规模小,并以适宜技术的采用为基础。

对于城乡联系,Stohr和Taylor指出需要在四个主要领域平衡其关系以使自下的发展成功。①在政治上,应给予农村地区更高层次的自主权,以改变政治权力自城市向农村的单一流向。②应修正全国的价格体系,使之更有利于农村和农业产品。③应鼓励农村的经济活动超过当地需求,以形成更多的出口。④应重建整个交通、通讯网络,不仅在城市与农村间,也在农村的乡村之间。

Lipton、Rondinelli及Stohr和Taylor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注重城乡关系对发展的影响,尤其是这种关系如何决定相对稀缺的资源在社会中的分配。为此他们明确了两个大问题:①尽管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区别不总那么明显,在城市和乡村间仍然存在多种联系,这些联系为衡量城乡相互作用提供了基础。进一步,可以考察不同的人和地区各自在不同类型的城乡相互作用中的受益状况,由此,就能把这种交流与更广阔的空间经济社会转换联系起来。②有众多的因素影响城乡间的资源流动,虽然其中很多是经济因素,如贸易、价格政策等,应该强调的是,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他的因素,如人们的观念、发展的思路、不同阶层的利益等也对资源流的方向产生影响,也须纳入城乡相互作用的分析范围内。

3 理论和现实:长江三角洲地区空间经济转换的特点

我们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收入、劳动力的行业分布、乡镇工业的数量和分布等指标进行了分析,其结果反映出许多desakota模型所描述的特征。这些分析还表明,这一地区正在经历的经济结构转换与西方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十分不同。首先,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转变有着历史的动因。尽管中国农村工业有着基本一致的组织结构,不同的外部因素却使区域间产生明显的差异,这些因素有:传统的人力和农业资源基础、与市场 and 城市工业的接近度、1949年以前的工商业传统、农业计划体制下的粮食及其他作物的定购任务、改革前的工业化程度等,此外,地方当局有时对农村工业化和当地的体制有很大的影响力。六十年代后期,苏南的苏州地区就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江苏省在几次全国性的以农业为纲关闭社队企业的运动中受到的影响也较小。这些因素使苏南在七十年代末改革之前已站到农村工业化的前列,而中国其他县的乡镇企业发展要晚得多。因此,在研究农村的转变进程时,不能忽略范围更广的国内国际的发展变化及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后果。其次,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转变是多元化的。尽管农村工业在空间上迅速繁衍,我们却不能忽略农业的剧变及其意义。以往关于农村非农行为发展的研究往往不注意农业转变的重要性,而这种农业转变正是长江三角洲许多农村工业发展的基础。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发展看来有两大方面的作用,一种是较为明显的生产关系,即农产品加工工业。第二种作用也许更为重要,即农业的发展和扩张引起其他产业的生长。有人指出绿色革命引起的农业扩张能释放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引起其他产业的增长,而反过来,农村非农产业的增长又给提高农业生产率提供了机会。因此,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内部的联系也是决定农村工业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由于受影响的个人、团体、地区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不同,发展的过程是不均衡的。Koppel (1991) 提出,农村转变发生

在两种范围内,在农村社会的范围内部,转变是其结构、成分及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功能的演进。在农村社会的范围外部,转变往往是不连续的,往往是外部的关系、结构、进程修改或完全替代了现存的经济、社会、政治过程。两种变化间的差异并非总是很明确,转变可能在两种范围内同时发生,外部引起的转变也不象Koppel所指的那样一定是有害的。在许多方面,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变革证明了这一点,很明显,广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与香港的外部联系,这一区域的农村变化也较多地来自于外部的力量。有人指出,“相对而言,广东曾是一个相对落后,以农业为主的省份,除了地理条件外,其唯一的优势是廉价但素质较低的劳动力”。从长远看,广东农村地区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其他地区有什么意义难以确定。与此相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发展则显示出较强的内在驱动力。外部影响对这一地区当然也很重要,但我们认为,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区域内部,并且依赖于与区内外部城市的相互作用和联系。

参 考 文 献

- [1] Corbridge, S. (1982). "Urban bias, rural bias,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 appraisal of the works of Michael Lipton and Terry Byres," In Harris, T. (Ed.) Rural development: Theories of peasant economy and agrarian change, London: Hutchinson, pp.94-116.
- [2] Ginsburg, N., Koppel, B., McGee, T.G. (Eds.) (1991).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 [3] Koppel, B. (1991). "The rural-urban dichotomy reexamined: Beyond the ersatz debate?" In Ginsburg, N., Koppel, B., and McGee, T.G. (Eds.)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p.47-70.
- [4] Lipton, M. (1977).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Maurice Temple Smith.
- [5] McGee, T.G. (1989). The emergence of mega-urban regions in Asia: A research proposal,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6] Rondinelli, D.A. (1985). Applied methods of regional analysis: The spatial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 [7] Stohr, W.B., Taylor, D.R.F. (Eds.) (1981). Development from above or below? The dialectics of regional plan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chester: Wiley.

欲订阅1994年《城市问题》者从速

人人身边有城市问题,人人需读《城市问题》。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双月刊《城市问题》,已创刊10年,是目前国内众多城市刊物中创刊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本刊设立了“城市科学”、“城市建设与发展”、“经社问题”、“城市管理”、“城市文化”、“北京研究”、“小城镇研究”、“古城今昔”、“市长论坛”、“区街工作”、“窗口透视”、“市民共议”、“外国城市”、“信息与动态”等14个栏目,充分表明本刊是城市建设、管理、发展的参谋,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是市民生活的良师益友。凡是关心城市问题的人,想了解城市问题的现状及其症结,认清城市问题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并参与探讨解决城市问题途径的读者,请快来订阅《城市问题》杂志。《城市问题》具有适应广大读者需要的风格。本刊的综合性、实践性、知识性、信息性、生动性、操作性已吸引了各层次各类型的广大读者。本刊由北京市报刊发行局统一发行,全国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82-485。欲订阅,从速! !